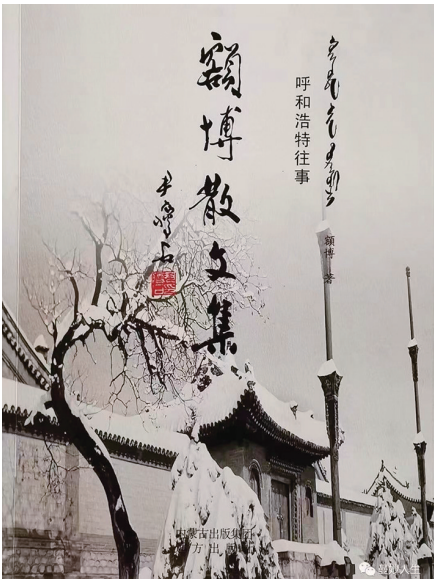




为我们的时代留住更多鲜活的记忆

——在《额博散文集》作品分享会上的感言

●王新民



我和额博认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候,呼和浩特唯一正规的公共游泳池就建在大马路体育场旁,我们的友谊就是在那里开始的。

夏天来了,到游泳池耍水是当时呼和浩特青少年最时髦的活动,我虽然水性不好,但爱红火,所以也是游泳池的常客。不过也就下水扑腾几下便坐在泳池边晒太阳。那时常常看到一个身材高挑、浓眉大眼的少年,只要他一出现,身边便围来一群新城区的小伙伴,大家都叫他“和平”,后来才知道他有个好听的蒙古名字——额博。他性格开朗活泼,爱开玩笑,常在泳池里追逐打闹、无忧无虑,特别开心。

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我成了电视台的编导,他去了日报社,挎起了相机。

记得1981年夏天,无锡七十岁老人李立成骑着一辆国产自行车周游全国来到呼和浩特,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新闻,我们决定制作一档节目送给央视,同时还想留下一份影像资料,额博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的御用记者,拍下了一幅幅照片。如今这些照片成了那段激情岁月最真实的记录,弥足珍贵。

四十几年过去了,谁能想到,那个游泳池里贪玩的少年会成为蜚声海内外的

摄影大家,更没有想到一个原本用镜头记录岁月的他,竟拿起了笔在自媒体上写起了文章。他写老城旧事,写身边的人,写市井百态。文笔流畅平实,内容鲜活生动,每发一篇,都成了我们追观的对象,乐此不疲。现在这一篇篇随笔,终于集结成《额博散文集》正式出版,并在内蒙古文学馆举办了盛大的作品分享会。

每每品读额博的散文,我都能真切感受到独属于他的几个非常鲜明的特色。一是真实、朴素、不端架子。始终以平民视角,用普通人的眼光老老实实写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生活往事。他的文字从不修饰、从不煽情,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没有宏大的叙事。犹如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和你拉着家常,娓娓讲述着往事,亲近而温暖。

如写照相馆橱窗的明星照,写烧麦馆的人情事理,写自行车在呼和浩特的历史,无不引起我们这代人的深切回忆和共鸣。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普通家庭拥有一辆“飞鸽”“永久”自行车,便会引来街坊邻里羡慕的目光。五十年代会骑车的孩子特别少,谁家有一辆自行车,就等于拥有了整个童年的快乐。孩子年龄小,腿不够长,没法正常跨骑,只能掏裆骑,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依旧骑得不亦乐乎;一辆旧自行车,一群发小轮流抢着骑,穿梭在老城街巷,就是整个夏天最快乐的时光。这些细节,只有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没有虚构、没有美化,原汁原味,把物资匮乏年代里少年最简单、最纯粹的幸福完整留存了下来。

他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文字的描述自带画面质感,这是额博散文最独特、与众不同之处。作为专业摄影家的额博,常用镜头观察生活、定格岁月,这种职业特质,完全融入了他的文字里。

有人写散文靠抒情、靠修辞,他写散文像拍照片,一笔一画都是取景,一章一节都是定格画面。

他写西河沿,也就是扎达嘎河:“……旧城北门往西是由北往南流淌的扎达嘎河。河水是从大青山乌素图沟流出的山泉水,甘甜可口,沿河的居民、商家枕河而居,妇女在河中洗菜,男人挑水

饮马。每到夏季,两岸风拂垂柳,石间溪流。城边居民在柳下纳凉读书,扎达嘎河真可谓是归化城的母亲河。”

他写牛桥的民俗:“前些年,常能见到留着山羊胡的马老爷子,提着大铜壶卖‘油茶汤’。还有一位推着车卖热枣糕的胖老头,用男高音吆喝:热、热、热枣糕,听着不由地让路人止步,口中生津,切上二斤黄米热枣糕回去。”这些文字把市井民俗写得画面感十足。

在他的文字里,新旧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而是有人情、有故事、有岁月温度的老城老街;那些普通的老城民居,也不再是破旧的老房子,而是承载了几代人起居生活、邻里温情的家园。配上他自己拍摄的老照片,图文并茂、情景交融,读文字就像跟着他的镜头欣赏一部形象生动的纪录片,重走了一遍老青城的街头巷尾。

如果说前两点写的是“人的生活”,第三个特点便是“城的岁月”,他以个人记忆留存了城市历史,在个体往事里珍藏着时代的印记。看似一篇篇零散的生活随笔,写旧物、写民俗、写街巷、写童年,实则字字句句,都是呼和浩特珍贵的城市变迁史。额博将自己的亲眼所见,用细致的笔

触,把绥远城墙、旧城北门、街巷布局、世人百态、岁月更迭,一一纪录在文章之中,让人们看到街巷的消失与城市的扩建,看到老城格局的改变。

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历史,既需要宏大的官方正史和地方志,更需要额博这样鲜活的民间个体记忆。正史记录的是时代框架、宏观脉络、重大事件。如果说正史是一座城的“骨架”,那么额博这种来自个人亲历、饱含生活细节、带着温度的书写,就是一座城的“血肉”。

没有民间记忆的历史,是冰冷、空洞、不完整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自行车、老街、民居、城墙、发小、市井民俗的细碎记忆,我们呼和浩特的城市历史,才变得鲜活、可感、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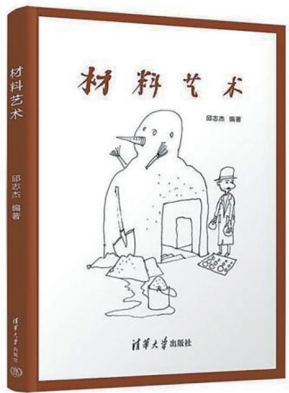
这也是《额博散文集》出版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本个人怀旧的散文集,更是一本青城民间生活史、百姓岁月史。它提醒我们:宏大叙事之外,普通人的生活记忆,同样是最珍贵的城市文脉、时代文脉。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像额博一样的本土作者,拿起笔、记录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时代,留住更多鲜活珍贵的民间记忆。



本文作者与额博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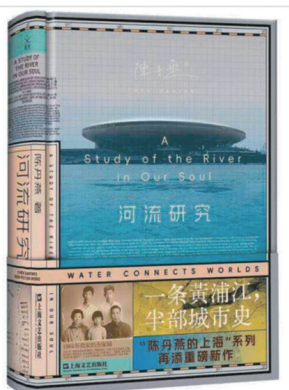


《材料艺术》



邱志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河流研究》



陈丹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黄浦江出发,走向伦敦、纽约、汉堡、东京、澳门、阿姆斯特丹等世界港口城市的水岸,在码头的气味、光线与人群中行走。在作者笔下,河流是一种缓慢、坚定、持续影响着城市气质的文明力量。本书凝结作者二十余年田野调查与城市实践经验,既写消失的河汉、旧港的光影,也写公共空间如何被争取、被保护、被立法确认。河流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承载着城市的伦理、记忆与未来方向。

(据《西安日报》)

语言美学里的生命哲思

——读慕白诗集《有诗为证》

●北琪

细读《有诗为证》这本诗集,慕白的诗歌像一面镜子,既映照出生活的质朴本真,又折射出深邃的哲学思考。他的文字看似简单,却能在细微处显深意,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读慕白的诗歌,能让人看见美好,使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获得心灵滋养,这种审美体验甚至具有疗愈功能,而且具有永恒性,也印证了苏轼的那句话:唯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

慕白曾经说:发自肺腑,才是真言。诗缘情发声,不做文字游戏。的确,他的语言基本上不加雕饰,情真意切。慕白的诗歌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人话,讲真情。”诗集中《有诗为证》就能充分体现这种质朴之美,他用最平实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温馨的生活画面:“我们就守在一间茅草屋前/看轻风抚摸小草,听雨声呢喃”。这些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本真之美。诗人把抽象的时间概念具象化为“阳光一寸一寸挪动”,这种表达方式既生动形象,又暗含对生命流逝的深刻感悟。“等天全黑了/也不让星星搀扶月亮回到屋里/我依然全听你的虫鸣不懂时间之苦/允许整夜弹唱催眠曲”,尽显爱情的真诚和浪漫。

语言简练而耐人寻味,是慕白诗歌的另一个特色。诗歌语言的简练,恰似中国画中的留白,以有限的笔墨唤醒无限的想象。这种凝练并非简单的删减,而是对冗余的摒弃,对本质的提炼。真正简练的语言,需在克制中完成情感的精准投射,留下无尽回响。

简练的语言往往具有多义性。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言,诗歌中未言明的部分,恰是读者参与完成创作的邀请函。慕白在《在长白山,看雪在飞》一诗中这样写道:向上,还是向下/与理想的相遇都难/希望总是虚无/没有雪,你是否也可以活着。这种语言的留白,使读者在停顿中填补多重涵义,从而提升了诗歌的生命力。

慕白简练的语言常依赖意象的跳跃与组合。“风没有来处,也没有归宿/昨夜里有些人跟着风走了/走得

无影无踪/可我的脚却长出了根”(《我的脚长出了根》),这种语言如同闪电,以最短路径击中核心,而读者则在短暂的震撼后,于反复咀嚼中品出更深的苦涩。

简练绝非是晦涩的,其力量来自语言的直指人心。真正的简练,是经过千锤百炼后的澄明。慕白的《桃花潭畔》中“一朵桃花只有在/一首诗里才永不凋谢”“上不了高山,也下不了大海/我只好让你,住在心里”等诗句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诗歌语言的简练更显珍贵。慕白的诗歌拒绝浮夸的修辞,以最少的音节唤起最大的共鸣,简练不是形式的选择,而是成为存在的必需。

通过自然意象传递生命哲思,这是我对慕白诗歌最深刻的印象。慕白主张“诗必须有言外之意,言此及彼。”他善于通过自然景物表达人生哲理,让象征语言闪耀智慧的光芒。他的诗里,随处可见闪耀智慧光芒的句子,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与顿悟。在《观瀑》中,“水要站起来就不怕悬崖”这句诗,表面上写的是瀑布的壮观景象,实则暗喻人生面对困境时应有的勇气和魄力。这种借景抒情的手法,既保留了东方文化的含蓄美,又赋予了诗歌现代性的思考维度。这些诗句通过象征、暗示的手法,来表达更深层次的含义,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在海拔四千米的格尔木/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矮小”这句诗,通过地理高度与心理感受的强烈反差,让人瞬间领悟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放下,无惑不惧”的简洁表达,则传递出豁达的人生态度。

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最简单的表达中。慕白用最平实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这种言简意深的语言风格,正是其诗歌魅力的源泉。读慕白的诗歌,不仅能获得美的享受,更能得到智慧的启迪。

万物都会衰老,会消失。但只要心上有诗,生命就会芬芳!正如慕白所说:诗是灵魂最后的栖息地,有诗为证,春花还在,诗中的人与事永存。

无踪影/可我的脚却长出了根”(《我的脚长出了根》),这种语言如同闪电,以最短路径击中核心,而读者则在短暂的震撼后,于反复咀嚼中品出更深的苦涩。

简练绝非是晦涩的,其力量来自语言的直指人心。真正的简练,是经过千锤百炼后的澄明。慕白的《桃花潭畔》中“一朵桃花只有在/一首诗里才永不凋谢”“上不了高山,也下不了大海/我只好让你,住在心里”等诗句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诗歌语言的简练更显珍贵。慕白的诗歌拒绝浮夸的修辞,以最少的音节唤起最大的共鸣,简练不是形式的选择,而是成为存在的必需。

通过自然意象传递生命哲思,这是我对慕白诗歌最深刻的印象。慕白主张“诗必须有言外之意,言此及彼。”他善于通过自然景物表达人生哲理,让象征语言闪耀智慧的光芒。他的诗里,随处可见闪耀智慧光芒的句子,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与顿悟。在《观瀑》中,“水要站起来就不怕悬崖”这句诗,表面上写的是瀑布的壮观景象,实则暗喻人生面对困境时应有的勇气和魄力。这种借景抒情的手法,既保留了东方文化的含蓄美,又赋予了诗歌现代性的思考维度。这些诗句通过象征、暗示的手法,来表达更深层次的含义,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在海拔四千米的格尔木/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矮小”这句诗,通过地理高度与心理感受的强烈反差,让人瞬间领悟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放下,无惑不惧”的简洁表达,则传递出豁达的人生态度。

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最简单的表达中。慕白用最平实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这种言简意深的语言风格,正是其诗歌魅力的源泉。读慕白的诗歌,不仅能获得美的享受,更能得到智慧的启迪。

万物都会衰老,会消失。但只要心上有诗,生命就会芬芳!正如慕白所说:诗是灵魂最后的栖息地,有诗为证,春花还在,诗中的人与事永存。



温德尔——这是内蒙古青年作家刘秉政的蒙古语名字,意为“大高个子”。刘秉政的小说集《对称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24年)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自高处的视角:不是为了俯视,而是为了在更为广阔的精神版图上,辨认那些在文字深处孤独行走的灵魂。这部由十三个短、中篇交织而成的作品集,以象征与寓言为共同底色,构筑了一个兼具哲学深度与道德关怀的文学世界。

刘秉政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罕见的总体性特征,那便是对人性进行系统而严整的解构。在《一个男人的爱情》《桃之夭夭》《玉生烟》《化异》《断碑》等作品中,他反复探讨两种自我完成的路径:一种是不择手段的“成功”,另一种是恪守善良的“成就”。这种探讨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如同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揭示的悲剧观——“普通的人物,普通的环境”因“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其悲剧性因其普遍而更显震撼。

《对称轴》的核心意象即是“对称”——此岸与彼岸的对称性“梦魇般地笼罩着”作者。这不仅是一种形式结构,更是道德选择的两极张力。康德“善良意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宁可被践踏也不践踏别人”的理念,构成了作家精神世界的双重锚点。在这种张力中,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道德快感与优越感”——这不是自我陶醉,而是认清人性幽暗之后依然选择善良的清醒与坚定。

小说集中每一个故事的人物,无不是孤独地行走在“对称轴”上。他们“活着,有意识,在对称轴上写着文字”——这文字既是写下的故事,也是用生命本身书写的人生叙事。刘秉政将哲学思辨转化为文学语言,使每一个故事都成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具象化实验,也使《对称轴》这一书名成为全书最重要的隐喻。

《潮白河的女人》是这部小说集中唯一直接书写故乡的作品。刘秉政将主人公置于存在主义的苦难之乡,揭示了女人注定要成为人生战场上的“烈士”。文中对评剧唱腔的描写——“吞咽吐字的一板一眼铿锵有力中表现着一个女人的不屈不挠有理有据”——不仅精准捕捉了地方戏曲的形式,更深刻礼赞了在存在困境中如何保持人的尊严。苦难不是终点,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姿态才构成人的尊严。这种处理使《潮白河的女人》超越了地方书写的范畴,成为关于人类普遍处境的寓言。

《爱情实验》小说暗示,现代人的情感浓度与质量相比古人有大幅下降,于是“拯救者也是自救者”应运而生。平行时空理论的运用,使情感的可能性在多个维度展开。而《青春期》中的描写,则将生物性与精神性的张力具象化为一种怪诞的意象,读之恍然大悟。

在《酿蜜》《后园》中,有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声音,“却使我欣慰/宁静一步步的靠近崇高”。这声音的节奏成为作品“不折不扣的感情基调与思想脉络”。读者仿佛能够“嗅着文字神圣的气味儿,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书写”,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静静地感受着无限的时间”。这种书写经验超越了技术层面,成为一种精神活动。

读刘秉政的“后园”,不自觉地会想到鲁迅《秋夜》里的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种超时空的文字联想自然妥帖,让作者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上感受“大雪飘落野鸽纷飞”的另一种“后园”之佳境。

刘秉政的文字与思想最大的特征是“干净”——这不仅是修辞层面的精练,更是道德视域的纯粹。这种干净源自他的双重身份:作为书法专业出身者,他对汉字结构与书写节奏的敏感渗透进了文学创作;作为哲学专业出身者,他利用假期不间断地行走山河,完成自己哲思的闭环与精神的救赎。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交叠,使他的创作既有高度,又有大地般的稳妥与扎实。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指出:“忧郁沉思,其本质是清除对客体世界的最后幻觉,不是在世俗层面上嬉戏,而是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以及自身旁边的那个世界。”刘秉政的创作深得此中三昧。他不满于对现实世界的表面描摹,而是通过象征与寓言,清除对客体世界的最后幻觉,即某种绝对的道德尺度上——重新发现人以及人旁边的世界。这种发现不是浪漫主义的自我陶醉,而是严肃的、近乎残酷的自我审视,这在《一个幽灵的日记》《白日》《天鹅之死》等作品中均有书写。获得孙犁散文奖也证明了他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与影响力——这种荣誉来自他对文学应有之重的坚持,对快速消费文化的抵抗。

《对称轴》中的十三篇作品,犹如十三次灵魂的探险,十三个关于人的可能性的道德实验。它们共同追问:在世俗与理想之间,在善与恶之间,在自我完成的各种可能路径之间,人应该如何选择?刘秉政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但他通过文学的象征与寓言,通过对人物命运的严肃呈现,暗示了一种方向——在清除对客体世界的最后幻觉之后,依然选择善良,依然选择崇高,依然选择在孤独的对称轴上,有意识地活着,书写着。

这是一种忧郁的沉思,也是一种清醒的坚守。在当代文学日益趋向娱乐化与碎片化的语境中,刘秉政的《对称轴》提供了一种稀缺的阅读体验——它要求读者放慢速度,如同阅读古典哲学或范式文本一般去沉思。而这本身,便是一种道德选择。

《对称轴》的道德认知与存在之喻

●于志超